青年评论

■青年观察

腹有诗书心自安

从杨海锋老师的故事，想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传统词语：“读书人”。传统中的“读书人”大抵是这样一种形象：有判断，有坚持，有敬畏，有热心，信奉文化，信仰道德，重义轻利，或还迂腐到可爱

□特约评论员 郭之纯

读杨海锋老师的故事，如在烦闷夏季忽遇习习凉风。

在这个浮躁的功利社会，将“无用”的传统经典奉为瑰宝，孜孜不倦地进行义务传播，在有些人看来，此举或有些迂阔。但正是这种看起来不合时宜的做法，表现出一种可贵的精神之美。

之所以说这是一种美，是因为这种做法于其个人，表现出对自我完善的追求；于学生，体现出为师者的理想和责任感；而于传统文化的延续，这是一股虽然微小却很值得珍视的推动力量。

观诸现实社会风尚，他的坚持又是一种提醒。在这个特别强调成功、特别追求个人经济价值实现的时代，教育和读书都严重功利化了，很多人的心志被流行价值观所扭曲，被时代潮流所左右；而一个又一个被扭曲的个体心志，又使国人的整体人文素质呈明显滑坡之势。所以，旗帜鲜明地提倡“与经典同行，以圣贤为友”，帮助学生培养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意识，这种人文教育的内容和方式，在此时是非常值得提倡的。

从他的故事，我想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传统词语：“读书人”。传统中的“读书人”大抵是这样一种形象：有判断，有坚持，有敬畏，有热心，信奉文化，信仰道德，重义轻利，或还迂腐到可爱。义务教人读经典的杨海锋，很符合这样的标准，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“读书人”。

在一所商学院能够出现这样的“读书人”，令人很欣慰。但同时也反衬出另外一种现实的遗憾：当下，无论在哪级哪类学校，推而广之，包括各类文化和科研机构，传统意义上的“读书人”已经很稀缺了。很多人注重知识轻视文化，学历虽高却不过是“知识匠人”。甚至，有些等而下之者，所汲汲者惟有名利，不仅对于“无用”的传统经典不屑一顾，还自觉不自觉地贬抑那些高贵的文化和价值观，而对一些庸俗的东西却大肆追捧，致使谬种流传，贻害世人。时下，有很多教授以成为“老板”自得，原因便在于此。

世相如此，杨海锋一人的努力怕是难以扭转乾坤。但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为人师表者或其他知识分子，能够认真思考一下他的主张，体味一下他的想法和做法，以自己的努力给力传统文化的传播，提升国民素质，改善社会风气；同时，也让自己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中暂时安静一下，找到文化，找回自己。

（相关报道详见A14版）

■两会聚焦

看不懂的“公民信息库”

若说是为了“反腐”，就不由人将其与2009年流行的一句最牛官话联系起来：“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财产？”

□阿平

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7日在两会上透露，为防治腐败，国家将建立“公民信息库”，将公民的个人资料、财产、住房、收入信息，以及公民主要家庭成员的信息以链接的方式组建信息库，并实施全国联网，信息共享。崔海容并预言公民信息库“在未来能够有效预防腐败”，并举例说：“譬如一个官员原本有3套房子，但他只登记了1套，利用其他方式在他的特殊关系人上登记，这样的话我们不好查了。如果建立这个系统，他的亲属相关信息都可以显示出来，我们对官员的情况也会更了解。”

崔海容副局长所描绘的一幅反腐前景，确实让人十分向往。但有一事不解，要了解官员的腐败信息，只需“官员信息库”即可，为何非要建一个“公民信息库”呢？我也搞不懂要了解官员信息，与这个数据库有何关系，难道没有这个数据库，反腐机关就无从了解官员的个人信息吗？这显然不符合人们的一般认知。

再者说，这个“公民信息库”不可能是一个对所有公民开放的信息库，否则公民个人信息将无从得到保障。那么这个信息库事实上依然由有关部门“内部掌握”，跳脱于社会的监督之外。这不免让人疑惑，有关部门为何偏偏对“公民信息库”情有独钟，而全社会长期推动的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”却一直进展缓慢？

其实反腐并不难，只需发挥公民作为“无所不在的眼睛”的作用。像崔副局长所举官员房产信息的例子，与其相信“数据库”，何不相信老百姓的举报？当然，前提是，必须先保障老百姓举报的权利，先保障老百姓说三道四的权利，先保障媒体“扒粪”的权利……这些权利得到了保障，则腐败差不多无可遁形。而恰恰在这些方面，当前的现状让人忧心。

本文不是要反对建立“公民信息库”，“公民信息库”对于建立社会征信体系，对于政府部门对于社会秩序的管理，或有其意义。但若说是为了“反腐”，就不由人将其与2009年流行的一句最牛官话联系起来：“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财产？”

（杭州 媒体评论员）

没有考核与问责 “4%”必然成空

光有“百年大计、教育为本”的口号远远不够，甚至光有“财政教育投入占GDP4%”的目标也远远不够，现在我们需要的，是确保“4%”能够尽快落实的考核与问责机制

□赵勇

“财政教育投入占GDP4%”多年来未能兑现，这已经是个老话题，但《中国经济周刊》在两会期间再度将这一话题抛出来，却仍然吸引了足够密集的关注，可见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热度，并未因长时间关注无果而消耗掉。

报道说，早在1993年制定的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第48条中就曾明确提出：“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%”。也就是说，按此纲要，到2000年，4%已经成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比的下限。但现在已经是2011年，“财政教育投入占GDP4%”却仍然未能实现，成为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设想。虽然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年—2020年）》再次将实现这一目标的年份定在了2012年，但有了这样尴尬的背景，人们对“2012年达到4%”心存疑虑，就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“财政教育投入占GDP4%”为何多年来一直难产？人们一直在追问。一些官员习惯性的解释是：政府财力不够。但很明显，这只是托词——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幅一直高于GDP增幅和居民收入增幅，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。这个时候再拿“政府财力不足”做挡箭牌，是无视现实、敷衍塞责。至于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所说的“4%至今未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偏低”，则更是无稽之谈。财力不是问题，问题是财政收入的使用方向出了问题。近年来人们所看到的现实是，在一些地方，官员们打造政绩工程和公款消费时，出手之阔绰简直令人叹为观止。简单来说，并不是财政没钱，而是一些官员根本就没想过要把更多的钱用在教育上。政绩工程和公款消费紧紧系着官员们的乌纱帽和仕途通道，一些官员当然会不遗余力；相比之下，教育投入见效慢、也与政绩关联度不大，一些官员自然懒得上心。这就涉及到一个考核机制的问题，考核是指挥棒，挥向哪儿，底下的人自然就会走到哪儿。

“百年大计、教育为本”、“再穷不能穷教育”，这是曾经振奋人心的口号，但光有口号远远不够，甚至，光有“财政教育投入占GDP4%”的目标也远远不够，现在我们需要的，是确保“4%”能够尽快落实的考核与问责机制。根据教育部财务司、《中国统计年鉴2009》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，从2000年到2009年，以4%的比例为目标，则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0年累计“欠账”已达16843亿元。2002年到2003年间，经费投入甚至还出现了0.06%的倒退。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现实，是否能够拿出有刚性约束力的考核方案？是否能够严格问责？对这些问题的肯定式回答，即为“4%”走入现实的基石。

（江苏 媒体从业者）